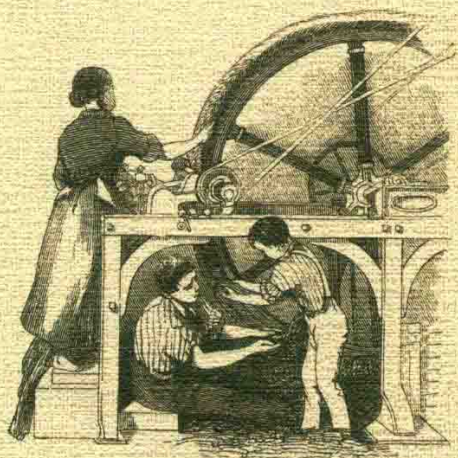


二十世纪人文译丛

国民经济、国民经济学及其方法

〔德〕古斯塔夫·冯·施穆勒 著

黎 岗 译



非外借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二十世纪人文译丛

国民经济、国民经济学 及其方法

〔德〕古斯塔夫·冯·施穆勒 著

黎 岗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民经济、国民经济学及其方法 / (德) 古斯塔夫·冯·施
穆勒著 ; 黎岗译. —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2017

(二十世纪人文译丛)

ISBN 978 - 7 - 100 - 15435 - 2

I . ①国… II . ①古… ②黎… III . ①国民经济 IV .
①F01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248574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国 民 经 济 、 国 民 经 济 学 及 其 方 法

〔德〕古斯塔夫·冯·施穆勒 著

黎 岗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15435 - 2

2017年11月第1版 开本 640×960 1/16

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张 9%

定价: 36.00元

GUSTAV von SCHMOLLER

DIE VOLKSWIRTSCHAFT, DIE VOLKSWIRTSCHAFTSLEHRE
UND IHRE METHODE

本书于 1893 年初版，1910 年由作者重新修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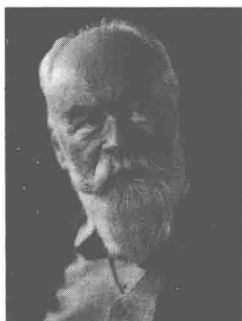
本书根据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维多里奥·克劳斯特曼出版社 1949 年版译出。

“二十世纪人文译丛”

编辑委员会

- * 陈 恒（上海师范大学）
- 陈 淳（复旦大学）
- 陈众议（中国社会科学院）
- 董少新（复旦大学）
- 洪庆明（上海师范大学）
- 黄艳红（中国社会科学院）
- 刘津瑜（美国德堡大学）
- 刘文明（首都师范大学）
- 刘耀春（四川大学）
- 刘永华（厦门大学）
- 陆 扬（北京大学）
- 孟钟捷（华东师范大学）
- 彭 刚（清华大学）
- 渠敬东（北京大学）
- 宋立宏（南京大学）
- 孙向晨（复旦大学）
- 杨明天（上海外国语大学）
- 岳秀坤（首都师范大学）
- 张广翔（吉林大学）

* 执行主编



〔德〕古斯塔夫·冯·施穆勒

作者简介

古斯塔夫·冯·施穆勒 (Gustav von Schmoller, 1838—1917), 德国经济学家, 被誉为德国新历史学派经济学的领军人物。在著名的“方法论之争”和“价值中立之争”中, 他分别是门格尔和马克斯·韦伯的论争对手。施穆勒尖锐批判古典经济学片面使用抽象演绎法的做法, 他认为经济学家必须从大量经验材料中才能归纳出经济规律。他的学术成就主要体现在: 提出一套独特的经济学方法论 (“施穆勒纲领”); 论证社会福利的时代必要性, 并促使俾斯麦政府创造了世界第一个现代社会福利系统; 经济和公共管理领域的历史研究。他的主要作品有《一般国民经济学大纲》《国民经济、国民经济学及其方法》《十九世纪德意志小手工业史研究》《普鲁士行政管理文献》等。

译者简介

黎岗, 广东人, 赴德留学12年, 德国奥格斯堡大学经济学学士、硕士, 德国埃尔福特大学经济学博士, 现任教于广东白云学院应用经济学院。研究领域为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经济学方法论和中国宏观经济。

总 序

“人文”是人类普遍的自我关怀，表现为对教化、德行、情操的关切，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对理想人格的塑造，对崇高境界的追慕。人文关注人类自身的精神层面，审视自我，认识自我。人之所以是万物之灵，就在于其有人文，有自己特有的智慧风貌。

“时代”孕育“人文”，“人文”引领“时代”。

古希腊的德尔斐神谕“认识你自己”揭示了人文的核心内涵。一部浩瀚无穷的人类发展史，就是一部人类不断“认识自己”的人文史。不同的时代散发着不同的人文气息。古代以降，人文在同自然与神道的相生相克中，留下了不同的历史发展印痕，并把高蹈而超迈的一面引向二十世纪。

二十世纪是科技昌明的时代，科技是“立世之基”，而人文为“处世之本”，两者互动互补，相协相生，共同推动着人类文明的发展。科技在实证的基础上，通过计算、测量来研究整个自然界。它揭示一切现象与过程的实质及规律，为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包括人的自然生命）提供工具理性。人文则立足于“人”的视角，思考人无法被工具理性所规范的生命体验和精神超越。它引导人在面对无孔不入的科技时审视内心，保持自身的主体地位，防止科技被滥用，确保精神世界不被侵蚀与物化。

回首二十世纪，战争与革命、和平与发展这两对时代主题深刻地影响了人文领域的发展。两次工业革命所积累的矛盾以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烈方式得以缓解。空前的灾难促使西方学者严肃而痛苦地反思工业文明。受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刺激，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科技与人文之互相渗透也走向了全新的高度，伴随着高速和高效发展而来的，既有欣喜和振奋，也有担忧和悲伤；而这种审视也考问着所有人的心灵，日益尖锐的全球性问题成了人文研究领

域的共同课题。在此大背景下，西方学界在人文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并以其特有的方式影响和干预了这一时代，进而为新世纪的到来奠定了极具启发性、开创性的契机。

为使读者系统、方便地感受和探究其中的杰出成果，我们精心遴选汇编了这套“二十世纪人文译丛”。如同西方学术界因工业革命、政治革命、帝国主义所带来的巨大影响而提出的“漫长的十八世纪”“漫长的十九世纪”等概念，此处所说的“二十世纪”也是一个“漫长的二十世纪”，包含了从十九世纪晚期到二十一世纪早期的漫长岁月。希望以这套丛书为契机，通过借鉴“漫长的二十世纪”的优秀人文学科著作，帮助读者更深刻地理解“人文”本身，并为当今的中国社会注入更多人文气息、滋养更多人文关怀、传扬更多“仁以为己任”的人文精神。

本丛书拟涵盖人文各学科、各领域的理论探讨与实证研究，既注重学术性与专业性，又强调普适性和可读性，意在尽可能多地展现人文领域的多彩魅力。我们的理想是把现代知识人的专业知识和社会责任感紧密结合，不仅为高校师生、社会大众提供深入了解人文的通道，也为人文交流提供重要平台，成为传承人文精神的工具，从而为推动建设一个高度文明与和谐的社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因此，我们殷切希望有志于此项事业的学界同行参与其中，同时也希望读者们不吝指正，让我们携手共同努力把这套丛书做好。

“二十世纪人文译丛”编委会

2015年6月26日于光启编译馆

目 录

编者序 / 1

一 国民经济 / 9

二 国民经济学 / 15

三 方法的本质 / 21

四 作为所有社会科学的开端的规则汇编与宗教体系 / 23

五 道德规范体系 / 27

六 关于国家、法律、国民经济的知识系统或一般理论 / 33

七 一般意义上的观察与描述 / 39

八 统计方法与调查 / 45

九 历史与历史的方法 / 49

十 分类方法：名称与概念 / 57

十一 原 因 / 63

十二 归纳方法与演绎方法 / 73

十三 规律性与定律 / 79

结 语 / 85

注 释 / 87

施穆勒主要作品 / 111

关于施穆勒的文献 / 113

附 录 施穆勒与《一般国民经济学大纲》 / 约尔根·巴克豪斯 / 115

译后记 / 139

编者序

符腾堡的前国家候补财政官员施穆勒（Gustav von Schmoller）在哈勒 3
第一次获得教授席位时，才26岁。其实他本来希望像父亲和其他先辈一样，
成为符腾堡管理部门的文官。然而，一条消息断送了他在职场的前程：他撰
写了一本小册子，在普鲁士和众南德意志王国间的关税联盟冲突中，表达了
非常不利于符腾堡的立场。

在哈勒，年轻的施穆勒也马上卷入到斗争之中，当然这次不是反对政
府，而是反对他在那里遇到的学术观点和教学方式——这个事件对他产生了
持久的影响。他充满激情地要求彻底抛弃这些东西，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
他都认为它们站不住脚。

那个时候，在几乎德国所有大学讲台上宣讲的是什么样的学说呢？尽管
它不再停滞于旧官房学的政策学¹中，却沉湎于在英国大师们的德国信徒影
响下被推到极端的唯理论，也就是所谓的曼彻斯特学派²。“部分是洞察力的
增长，部分是投机取巧得来的思想财富的增加，”年轻的施穆勒这样概括这
类学说的特征，“它使信徒们无法避免这种风险：越来越失去脚下现实的土
壤，越来越变成完全无立场的、苍白的、玄思怪想的、耽于抽象的、只知道
定义和划分的象牙塔学者，变成沉湎在空想里的社会主义者，变成只会算数
的数学家，变成教条主义、傲慢自大的、信奉冒险小说里自然法观念的理论

1 这个德语词按字面是“警察科学”（Polizeiwissenschaft或者Policeywissenschaft），是对旧官房
主义学说的称谓，它指一种关于国家内部秩序的学说，其内容涵盖了公法、国家管理和国民
经济学领域。此处按照朱绍文的译法（朱译罗雪尔的《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商
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5页）。——译注

2 曼彻斯特自由主义（Manchester Liberalism）是19世纪起源于英国曼彻斯特的政治、经济思潮，
它主要信奉自由贸易、人的自利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译注

家。这是完全脱离实际的唯理论的精神痼病。”

要对抗这种疾病，只能坚决地回归到以经验为依据的现实。只有如此，“才能向被痼病侵蚀的国民经济学肌体的血管里，重新注入血液和生机”。它将使以下两者成为可能：首先，国民经济学得以更好地实现它的目标，即成为一门普遍性的科学，以及更好地完成培养了解国民经济的新一代行政官员的任务；其次，这门科学得以通过完成重大的国民经济和社会福利任务，使自身不断完善，而这些任务正是那个时代迫切提出的。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学派所颂扬的“利益的和谐”，与现实中的社会矛盾极端不相符——这些矛盾恰恰出现在德国的工业经济迅速冒起，并谋求进一步发展的时候。

4 当“斯密（Adam Smith）大师”——德国经济科学的自由主义先驱——拒绝承认“劳工问题”的现实存在，并否认它可以通过一些不同于事物自然过程的人工手段得以解决时，我们该怎么办呢？

在此我们无法深入介绍，施穆勒在刚刚来到哈勒的时候如何与这种论调针锋相对，成为坚定的社会政策（Sozialpolitik）¹ 代言人，以及他以后如何建立了社会政策协会（Verein für Sozialpolitik）——正是施穆勒在1872年10月以他著名的“艾森拿赫讲话”（Eisenacher Rede）为其创办会议揭开了序幕。

当他跻身德国最优秀的经济学家行列时，年仅34岁。他再一次考虑接受到柏林的聘请，但直到1882年真正去那里任职之前，他在重新归属于德国的斯特拉斯堡大学整整工作了十年。在斯特拉斯堡度过的年头是他生命里最美好和最富创造力的时光。在哈勒他已经发现了自己的主要研究方向，而他在斯特拉斯堡以及以后在柏林的努力则进一步发展了它们。这里涉及三个主要领域：1. 社会福利问题；2. 在经济和公共管理的各个领域中的历史—现实性

1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Sozialpolitik”一词通常译为“社会政策”，其实这个德语词指国家辅助弱势的社会群体提高其福利的各项措施（今天它涵盖医疗保险、失业保障、养老保险、家庭政策等方面）。把它译作“社会政策”似乎太空泛，译为“社会福利政策”又略嫌狭窄。

——译注

研究；3.用于论证和创造一种新的国民经济学学说的方法论。

我们所引用的论文属于他的第三个工作领域。到哈勒之前，施穆勒已经计划承接他在图宾根大学经济系获奖的博士论文——它的研究对象是宗教改革时期占统治地位的国民经济观点——写一部书，即从它们与国民经济学的关系出发，探讨伦理学和方法论。作为对这本书的准备工作的论文，只有少数几篇被发表了，如一篇关于席勒的伦理和文化历史立场的论文、一篇后来付印的关于约翰·戈特利普·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的研究，以及在文集《国家和社会科学文献史》（*Zur Literaturgeschichte der Staats- und Sozialwissenschaften*, 1888）中跟其他人一道发表的关于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凯里（Carey）、洛仑兹·冯·施泰恩（Lorenz von Stein）、罗雪尔（Roscher）、克尼斯（Knies）、舍夫勒（Schäffle）、亨利·乔治（Herry George）、赫兹卡（Hertzka）、门格尔（Menger）和狄尔泰（Dilthey）的系列研究。之后他在1890年写下第一个对国民经济学学说和方法论的概括性阐述，即我们出版的这篇论文。它原来是为《国家科学简明词典》（*Das Handwö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 1893）撰写的一篇文章，出版于1893年。它在文集《社会政策和国民经济学的基本问题》⁵（*Grundfragen der Sozialpolitik und der Volkswirtschaftslehre*, 1898）里再次付印。1910年为了《国家科学简明词典》的第三版，这篇文章重新做了修订。施穆勒很清楚——正如他在这个新版本的一条注释中写道——他虽然在这些方法论的探究中没有使他的反对者遂意，甚至引起了跟他们的进一步对立，但“此外，重新修订令我非常着迷，因为我感到一种强烈的需要。在我最后的日子，这仿佛是我交付给将来的一份方法论的遗赠。借此，我确认了自己在多大程度上坚持了1890年的观点，在多大程度上在那之后的研究中取得了进步，以及我和其他人能在其中发现多少错误的、片面的或夸大其词的倾向”。人们比较两个版本之后就会发现，第二版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文本，而是对旧文的补充。旧版本的文字几乎被全无更改地保留下来，新的考察被插入其中或作为独立的段落添加进去。补充进去的部分一般仅仅限于一

些或长或短의简单探讨,只有原来的第六节《关于国家、法律、国民经济的知识系统或一般理论》被扩充为长达30栏的经济学思想史概述。

在这个版本里我们采用了如下处理方式:以注释的形式,按所在的位置把新添加进去的阐述附加在1890年版的原文之后。不过我们相信可以放弃重印思想史概述的部分,因为从它写就以来已经经过一个世代多的时间,对今天的读者来说,它在不少地方已经显得陈旧。

我们可以说,施穆勒在1910年坚持了自己1890年所阐述的观点。通过之后的补充,它们更多是被确认而不是被否定。就像人们读到的那样,只有在一个对他来说根本性的问题上,施穆勒相信必须对他早期的观点进行修正,即关于伦理价值判断在国民经济学中的合法性问题。1890年他曾经要求——他在1910年这样写道——科学研究应该在严格的方法的基础上尽可能限于事物或事件的存在,但现在他要与马歇尔站在同一阵线,加上这点:我们必须从“既定事实”(Sein)推断“发展方向”(Werden)。他在与“价值中立”的代言人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和桑巴特(Sombart)的辩论中,详尽地论证了这个观点。¹

6 如果说这个关于他的方法论的新文本留下了他透彻深刻的工作的证据——年迈的施穆勒把这些材料用在了这个新版本里,那么从某个角度来看,我们确实可以认为旧版本更为优越。因为旧版本放弃了深入到细节的文献性按语,并更专注于根本问题的讨论,所以它更加精炼,也更令人信服。

因为我们已经把文章本身带给了读者,也就用不着对它的内容进一步加以讨论。施穆勒拒斥一个脱离社会科学的“国民经济”概念。他在其中看到一个统一的、现实的整体:尽管构成它的个体经济和经济法人具有独立性,但它们被一些相同的心理和物质的力量主宰着,因为它的全部部分之间紧密地互相作用着,而且它的主要组织对所有部分施加着显而易见的影响。与之相应,国民经济学所必须完成的任务的范围也包罗广泛。它应该把文化生活

1 意为人类应当认识社会经济制度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现状,并根据这些知识,借助伦理价值,探讨完善这些制度的方向和手段。另参见原注⑥。——译注

中的国民经济现象，一方面放在它们与自然的、生物学的和技术的发展的联系中，另一方面置于与心理的、道德政治的和社会—历史发展的关系里考察，并借此解释国民经济的由来和发展。经济行为和经济制度不再应该仅仅从一些价值过程或者任何一种单纯的欲望推导出来，而是应该从那些心理力量推导出来，并应该在道德、习俗及法律的框架内被理解。

这是对国民经济学提出的一个巨大的任务！根据施穆勒的观点，它只能在大量费时的历史的、现实主义的研究基础上才能实现。只有这类研究，才能为我们从国民经济学和社会政策的角度理解历史，以及通过经验知识构造国民经济学理论，提供一个恰当的基础。这里所追求的、被施穆勒视为真实的东西，是经济科学中一个完全的创新。他在1883年已经对卡尔·门格尔这样呼吁：“一个国民经济学的崭新时代将要来临，但只能通过今天进行的历史—描述性材料的积累，而不是对已经蒸馏过一百遍的抽象旧教条进行再一次蒸馏。”

施穆勒曾一次又一次拒绝了这种要求：写作一部一般国民经济学理论。因为他认为还不是完成这项任务时候，还需要学者为此辛勤工作数十年；在不忘最后的宏伟目标的前提下，为了获得一种经过科学确证的经验知识，必须进行大量的专门领域的具体研究。他一方面亲自从事这些工作，另一方面又鼓励这类研究。在他编辑的《年鉴》¹里，没有一期缺少出自他笔下的论文。凭《国家和社会科学研究》，他为他众多的学生和其他年轻学者的最优秀的论文创造了一个出版机构。当他被选入普鲁士科学学会，他马上推动编写《普鲁士行政管理文献》(*Acta Borussica*)²——这是对18世纪普鲁士经济、行政管理的证明文件及公文的整理和出版。“社会政策文献”的课题是由他确定的，提供了对当时的经济生活中各式各样现实问题的事实性研究，因为他不认为历史材料具有相对于其他事实材料的根本优先权。而且，并

7

1 指著名的《施穆勒年鉴》(*Schmollers Jahrbuch für Gesetzgebung, Verwaltung und Volkswirtschaft*)。
——译注

2 这是一套卷帙浩繁的专门收集普鲁士国家治理方面历史材料的文集。——译注

非只有施穆勒和他的学生做着这种工作，这在其他大学也被普遍接受。这个运动的影响甚至蔓延到国外。在那里，同样产生了历史—现实性的、具有高度认知价值的国民经济学著作。来自各方面的事实材料如此被搜集起来，新的国民经济学研究领域被开拓，但一种一般国民经济学理论真的能够以大量的个别认识构造起来吗？施穆勒冒险做出了尝试。经过13年的长时间工作，他写下了他的《一般国民经济学大纲》（*Grundriss der allgemeinen Volkswirtschaftslehre*，以下简称《大纲》），一部规模庞大、密密麻麻地印成两册大八开本的作品。这是第一次，一个奠基在历史主义观念之上的经济学知识体系被建立起来。其他新领域的经验被引入国民经济学之中。社会和经济生活在它的整个多样性中被领会，并且在一束新的光芒下被描绘——这束光芒标志着一种最大限度的全面的教育¹。

这毫无疑问是一项功绩。不过在人们必须对这项成就致以敬意的同时，我们也知道，它确实还不太令人满意。它当时被“纯理论”的代表人物所抵制，这点很容易理解。但连那些期待施穆勒按他自己倡导的方法发展一套一般国民经济学理论的人也失望了。因为他们期待为经济学发现某些新原理，但《大纲》却离一种真正的历史性国民经济学理论仍然很远，问题显然是，这样的一种建立在如此广阔的基础上的理论——就像施穆勒为它所选定的——究竟是否可能被创造起来？

不过，如果人们因为这个任务在第一次尝试中没有成功，就要全盘否定它，也许还为时尚早。阿图尔·斯皮索夫（Arthur Spiethoff）——施穆勒最出色的学生之一——在好几篇文章里论述过，为了创建一种基于历史方法的理论，必须如何进一步发展和应用这种方法。他还在他的危机理论中为此

1 原文是“eine universale Bildung”，德语词“教育”（Bildung）除了指知识和技能的学习，更强调社会规范和精神价值的传授，它的目的是塑造一个人的完整人格。施穆勒在本书中曾强调总结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目的是知识传授。这也跟施穆勒对狭隘的“专业知识”的批评，以及他的学说的强烈跨学科性是相符的。——译注

提供了一个范例¹，说明事实搜集和理论分析如何能被互相联系起来。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在他跨度广阔的文章《古斯塔夫·冯·施穆勒和当今的问题》（“Gustav Schmoller und die Probleme für Heute”，1926）里指出了，施穆勒如何为了使依据历史方法的研究得以进一步发展，努力地保持开放的态度。这样我们也许就会明白，为什么施穆勒在试图推导出一般性的结论时那么小心翼翼。而当他变得愈年长和愈睿智时，他身上的这种倾向就表现得愈明显。这使他招致了“徒劳的历史相对主义”的指责。而他的其他文章最能说明这种责难如何没有根据。这些文章比他的《大纲》更好地让我们认识施穆勒的思想方法，因为在《大纲》里施穆勒认为，他必须从自身的领袖地位考虑，采取一种谨慎的态度。

自施穆勒高龄逝世（1917）以来，已经过了超过一个世代。我们获得了历史的距离，去公正地评价他个人和其著作。他引入了一场科学运动。为了把国民经济学从它当时所陷入的死气沉沉的停滞中解救出来，并把它带向新的发展方向，这场运动是必不可少的。作为这场运动的代表人物，他探索了国民经济学各种学术观点的历史，并以此在经济学思想史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当那些在学术争论中被涂在他的名字上的污泥掉落后，留下来的——用熊彼特的话来说——是这样一个人的画像：“一个忠实地服务于自己的工作、不断自我否定的人；他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我们的能力；他令敌人和朋友同样肃然起敬，无须通过赞美拔高，也无法被责难损害。”

奥古斯特·斯卡尔维特（August Skalweit）

1 指斯皮索夫的《经济波动：繁荣、危机、冲击》一书（Arthur Spiethoff, *Die wirtschaftlichen Wechsellagen - Aufschwung, Krise, Stockung*, Tübingen: Mohr, 1955）。——译注